

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 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

在中国西北部的广大沙漠中,掩藏着大量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就以不同时代的古城废墟来说,其数目之多,也是很惊人的。其中有的已被发现,有的还沉睡在茫茫沙海中。只以鄂尔多斯高原南部的毛乌素沙漠为例,其中已经确知是古城遗址的,就有 10 余处之多。还有一些古城,虽然见于文献记载,但其遗址所在,至今还渺无踪影。至于在毛乌素沙漠的南缘,也就是陕北和宁夏的万里长城附近一带,明显易见的城堡废墟,为数更多。这些大大小小的废墟,包括残存的万里长城在内,都是古代人类在这一地区进行频繁活动的重要遗迹。这些遗迹的存在,不但为研究这一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补充了一些确实可靠的物质资料,同时还为探索这一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而这一探索的结果,又是可以直接为当前的生产服务的。例如关于这一地区沙漠的起源以及流沙的移动,就是急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因为只有彻底调查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对毛乌素沙漠进行更全面、更有效的利用和改造。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治沙任务的带动下,自然地理和地貌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学研究工作跟不上,以致到现在对于毛乌素沙漠在人类历史时期的变化,仍然是若明若暗,缺乏一个明确的概念。一般说来,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以便于更好的、更全面地认识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事物的研究,如果抛开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过程不论,单从今日的现状来加以考察,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认识的。对于地理环境来说,也是这样。沙漠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对象,除去它的现状之外,还必须了解它的过去,特别是要了解由于人类的活动所导致的沙漠本身的变化。正是因为这一点,掩藏在沙漠中的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就有了十分重要的科学研究上的意义。历史地理的研究工作亟须借助于考古学上的发现及

其研究成果,更迫切希望考古工作者在考察和发掘工作中注意到足以说明自然环境今昔变化的各种情况,这不仅丰富了考古研究的内容,而且有助于当前生产斗争的实践。以下试从毛乌素沙漠中红柳河沿岸的两座古城废墟,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图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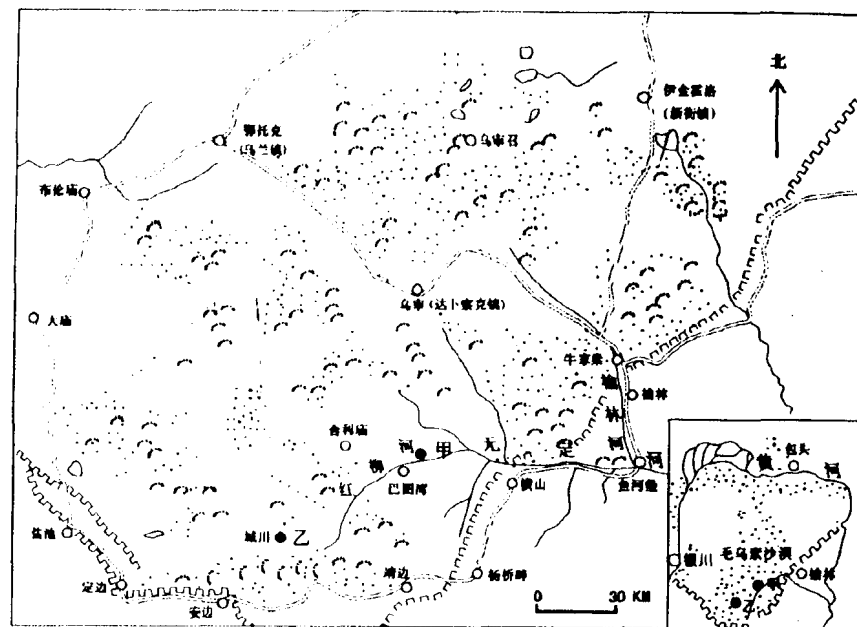


图 67 毛乌素沙漠略图

甲. 统万城遗址 乙. 城川古城

一、流沙侵袭中的统万城废墟说明了什么?

红柳河自西南而东北斜贯毛乌素沙漠的东南隅,其下游转向东南流,经陕北入黄河,又叫做无定河。

红柳河在穿越毛乌素沙漠时,开始携带了大量泥沙,水色浑浊,因此蒙语又称它做萨拉乌苏河,也就是“黄水”的意思。

萨拉乌苏河是考古工作者所熟知的名称,因为沿河一带如大沟湾、滴

哨沟湾等处,都有重要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被发现,^①“河套人”的故乡就在这里,它代表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新人”。有迹象说明,沿河两岸还有更多的石器时代的遗址等待去发现。

从大沟湾顺流而下,在转过巴图湾后大约10公里处,紧傍河床北岸,有古城废墟一座,矗立于滚滚流沙之中,这就是5世纪初崛起于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所谓“夏国”的都城——统万城,当地人民又叫它白城子(图68)。夏国是当时中国国内5个少数民族先后建立的十几个地方政权中的一个,它的创建者是匈奴族的首领赫连勃勃,因此又叫做“赫连夏”,有别于中国历史上以“夏”为名的其他政权或朝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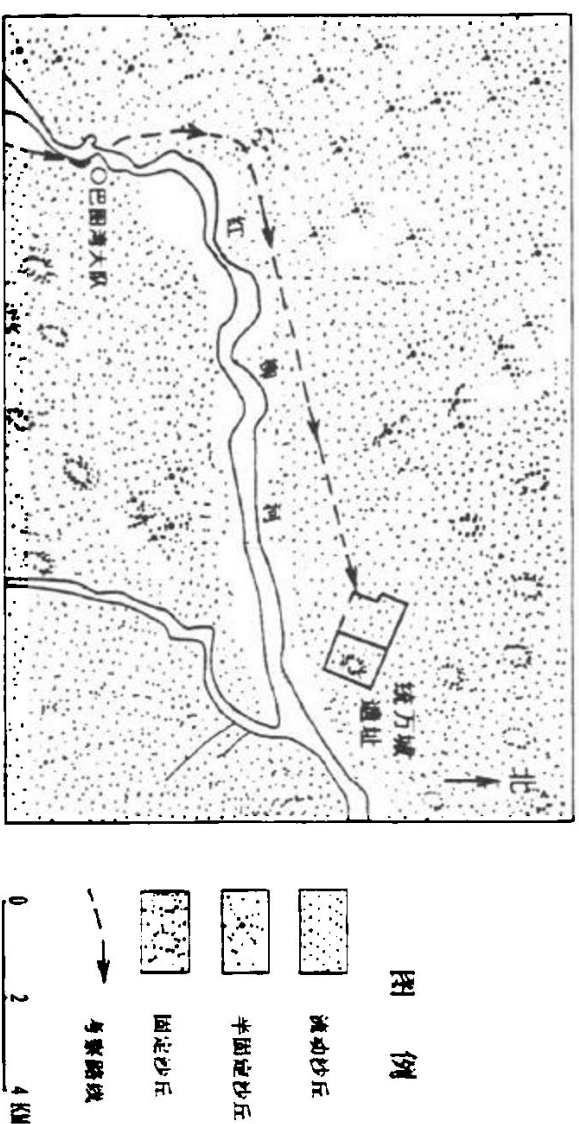


图 68 统万城城址位置图

统万城的遗址并不是近来才发现的。早在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陕西横山县知县何炳勋根据当时榆林府知府徐松的指示,曾亲自前往,进行调查,肯定了白城子就是统万城的故址,并向徐松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②徐松以研究西北史地闻名,注意实地考察,著有《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以及《唐两京城坊考》等书。但他这次派人去寻

① 汪宇平:《乌审旗萨拉乌苏河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上、下,见《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编:《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页9-16。原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4期;及《考古》,1961年第10期。

② 刘济南、曹子正纂修:《横山县志》,1929年石印本。

访统万故城,并没有写出什么有关的考证或著作。解放后,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博物馆组织了“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于1956年9月也曾来到统万城废墟进行考察,对比何炳勋的报告,又作了更详细的观察和描述,并采集到一些不同时代的文物。这次考察的结果,以《统万城遗址调查》为题,连同有关图片,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上。^①文章的结尾强调说:“我们深深感到‘统万城’遗址在中国民族史以及建筑和考古等方面,都是值得加以深入调查研究的”,但是此后未能看到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

统万故城的发现,为毛乌素沙漠中历史地理的考察,提供了可贵的线索。尽管到目前為止,还没有进行过任何考古发掘工作,但是只就遗址的确定这一点来说,就已提出了这样一些无可回避的问题:统万城初建的时候,这一带的自然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也象现在一样到处都是滚滚流沙,赫连勃勃为什么要把他的都城建造在这样一个地方?反之,如果建城之初,这里并不是沙漠,那么它又是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变成沙漠的?这些流沙又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问题的提出,应该说都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在过去却被忽略了。

史书记载说,统万城的建造,曾使赫连勃勃统治下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付出了十多万人口的劳役,并有数千工匠匠人惨遭杀戮。^②现在这座凝结了十多万劳动人民的鲜血和生命的巨大建筑的残余部分,经历了1500多年的风霜,依然屹立在一望无际的茫茫沙海中,迎着强烈的日照,放射出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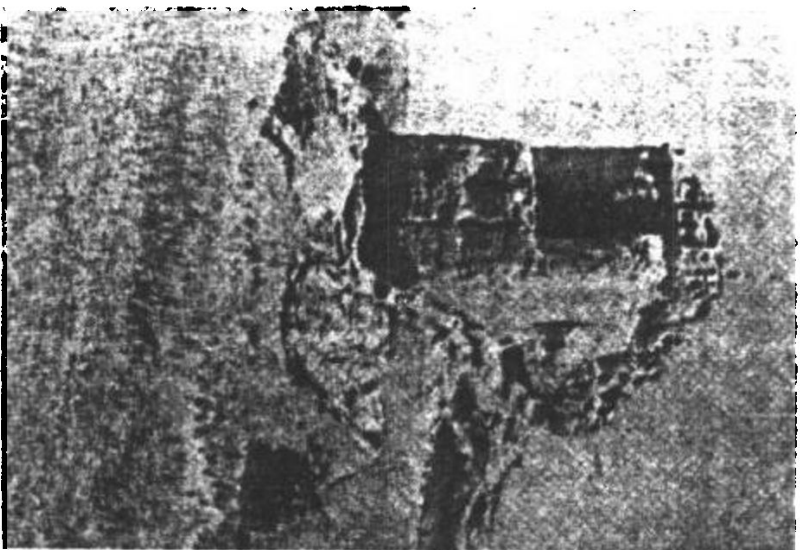


图 69 残存的统万城西北隅敌楼

① 《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② 《晋书》,卷一百一十五,《赫连勃勃传》。

眼的光芒。特别是它西北隅的那座高达24米多的敌楼,在10公里外,越过波浪般的沙丘,就可以远远望见它那雄伟的造型,正好像一座巍峨的纪念碑,不是用文字,而是用形象,写下了历史上劳动人民艰苦卓绝的创造,同时也揭露了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和暴虐。任何身临其境的人,联想到过去劳动人民的遭遇,就不能不为这一罕见的景象所感动。如果现在没有这样一座巍巍古城屹立在茫茫沙海之中,也就很难设想:眼前这一片渺无涯际的流沙,竟是最近1000年来的产物。

根据文献记录,赫连勃勃营建统万城,也是曾经考虑到它的地理条件的。当时为赫连勃勃王廷效力的汉族文人胡义周在所作的《统万城铭》的碑文中写道:

乃远推周文启经始之基,近详山川究形胜之地,遂营起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①

所谓“背名山”当是指统万城北的契吴山。^②“面洪流”正是傍城南而东注的红柳河。红柳河在《水经注》中又叫做奢延水或朔方水。按酈道元之注《水经》,上去统万城的兴建,不过百年,他在书中明确记述了统万城和奢延水的位置关系说:

奢延水……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东北流,……俗因县上,谓之奢延水,又谓之朔方水矣。东北流,迳其县故城南,……赫连龙升七年(公元413年,当年改元凤翔元年),于是水之北,黑水之南,……改筑大城,名曰统万城,蒸土加功,雉堞虽久,崇墉若新。^③

从最后这两句话来看,酈道元也是曾经走访过统万城的。更重要的是从他这段记载里,还可知道统万城也正是因汉代奢延城之旧而“改筑”的。

① 《晋书》,卷一三〇,“赫连勃勃传”。传称刻石立碑于城南,虽是歌功颂德之作,也反映了一些事实。这个碑如未被毁,或许还有发现的可能。

② 《元和郡县志》,卷十,清光绪六年金陵书局校刊本,页八上,“夏州朔方县”条称:“契吴山在其北七十里。”

③ 《水经注》,卷三,“四部备要”本,页一七下。

可见远自汉代以来,这里就是筑城设县之地,不可能是流沙遍野的荒漠。

至于上文所说的契吴山,史文也有记载说:

赫连勃勃尝“北游契吴,升高而叹曰: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①

这就进一步说明,在统万城初建之时,附近一带非但没有流沙的踪影,而且还是一片水草丰美、景物宜人的好地方。

那么究竟在什么时候,这里才开始遭受到流沙的侵袭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不能贸然作答,而且这也不是单单从统万城一个地方就能得到完全正确的是答案的。这里不妨先从文字记载上提供一点线索,更重要的是还有待于今后的实地考察。

《新唐书·五行志》有记载说: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十月夏州大风,飞沙为堆,高及城堞。^②

又唐咸通(公元860—874年)年间人许棠所作《夏州道中》一诗,也有如下的句子说:

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③

唐代的夏州城,就是赫连勃勃的统万城。从以上两条记载,可以确知在9世纪时,也就是统万城筑成后的400多年,这座古城已经受到流沙的威胁,但它仍然不失为鄂尔多斯高原上一个政治活动的中心。此后又过了

① 《太平御览》卷五五五,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页三上至下引崔鸿:《三十国春秋》。又同书载赫连勃勃墓即在契吴山,曰嘉平陵。又《元和郡县志》引此文,“美哉斯阜”一句脱“斯阜”二字。“未有若斯之美”一句,作“自马岭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此处所谓“马岭”,当指甘肃庆阳环县之间的马岭山,相传为汉代牧地,见《太平寰宇记》。所谓“大河”,即今包头以南之黄河。

② 《新唐书》,卷三五,志第二五“五行志”。

③ 李煦龄纂修:《榆林府志》,卷四九,清道光二十一年刊,页二上引。

100多年,也就是在10世纪末叶,当宋朝的统治者为了防止鄂尔多斯高原上少数民族的反抗而下令废毁夏州城时,史有明文说这里已是“深在沙漠”的地方了。^①这是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的事,从此统万古城,沦为废墟。

以上涉及流沙的记载,多是片言只字,只能权当参考,不能作为论定的根据。如果今后能够通过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从而获得一些更丰富更具体的线索,那将是对研究毛乌素沙漠的起源及其扩散的一项重要贡献。

二、从城川古城的建置追溯古代湖泊的消失,为探索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提供了新的线索

以上只是以统万故城的发现为例,说明了历史时期流沙扩散的一些表面现象,至于这里的流沙究竟从何而来,却是更加重要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红柳河上的另一座古城废墟以及根据这一古城所显示的周围自然环境的变化,则是更加值得注意的。

1956年秋,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为了继续了解萨拉乌苏河大沟湾一带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再次派人前往勘测,同时也对大沟湾以西大约15公里的一座古城遗址,进行了初步调查。古城遗址现属城川人民公社,因此被称为“城川古城”(图70)。古城南北长约750米,东西宽约500米,夯土修筑的城墙,兀立地表之上。城内则空空荡荡,大半辟为耕地,到处有瓷、瓦碎片的散布,并有宋代铜钱出土,据推测是元代的建筑,但究竟是元代的什么城也未加考定。^②

根据这一线索,前中国科学院治沙队组成的毛乌素沙漠历史地理考察小组,于1964年夏,也曾访问了“城川古城”。由于当地公社社员的热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淳化五年纪事。又淳化间宋琪曾任延州节度判官,熟悉鄂尔多斯高原南部一带情况,也曾说:“从银夏至青白两池,地惟沙碱。”见《宋史》卷二六四,本传。

^② 《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1期,“文物工作报导”专栏:《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组再度派员前往伊盟萨拉乌苏河进行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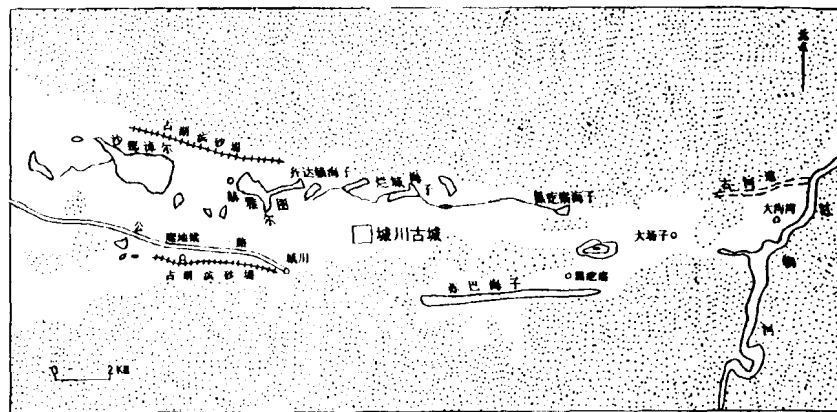


图70 城川古城附近古代湖泊的残迹略图

情帮助,曾采集到一些古代的文物和唐宋时代的铜钱数十枚,并在生产队中看到了当地出土的黑釉大缸和双耳黑釉罐等件。^①后来,又从城川公社供销社所收集的一大批出土于城川古城内的铜钱中,清理到从两汉一直到西夏和金代的许多枚,其中唐代的“开元通宝”占了很大的比例。北宋则从“太平通宝”一直到“宣和通宝”其间各个年号的钱币20多种,无一不备。此外还有不具年号的“皇宋通宝”、“圣宋元宝”等。其余如两汉、南宋、西夏和金代的都是极少数。而元明两代的,则一无所见。清代同治以外各年号的,又多起来,尤以“乾隆通宝”和“嘉庆通宝”为最多。这一偶然的发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暗示,即“城川古城”的历史一定早于元代。其次,根据这一遗址和统万故城的相对位置与距离,再和有关的古代地理文献相印证,可以推测这大约就是唐代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以后的宥州城。^②

^① 历史地理考察小组袁樾方:《内蒙古毛乌素沙漠南部人类活动遗迹》及采集品附图(未刊稿)。

^② 《地理》月刊,1965年,第1期所刊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在沙漠考察中的任务》一文中,曾把“城川古城”定为唐代旧宥州城,是错误的。后经历史地理考察小组成员朱士光指出,并根据他的考证作了修改。朱士光又曾于1965年夏继续前往“城川古城”一带进行历史地理的考察,上述出土的历代铜钱,就是由他清理的。文中有关城川古湖的资料,也是由他考察收集的。他还采了一定数量的孢粉分析的样品,文化大革命中都散失了,写有报告的初稿:《对城川地区湖泊古今变化的初步探讨》,也未及刊印。

按《唐书·地理志》“宥州”条下记载说：

宥州，调露初(公元 679 年)六胡州也，……开元……十一年(公元 723 年)克定康待宾后，迁其人于河南江淮之地。二十六年自江淮放回胡户，于此置宥州。……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改为宁朔郡。至德二年(公元 757 年)又改为怀德郡都督府。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复为宥州，宝应(公元 762 年)后废。元和九年(公元 814 年)复于经略军置宥州，……十五年移治长泽县。^①

这就是说从元和十五年亦即公元 820 年以后，新置的宥州治所就设在了长泽县城。因此从这时起，长泽县城又叫做宥州城了。另据《元和郡县志》所记长泽县与夏州城之间的位置关系说：长泽县东北至夏州 120 里。^② 现在统万城的遗址又恰好在“城川古城”东北大约 60 公里强(鸟道)。这样，把“城川古城”暂定为唐代的长泽县治，也就是元和十五年以后的宥州城，还不是全无根据的。希望今后能有更直接而确切的考古发现来作最后的论定。

考证“城川古城”的名称和年代，并不是我们工作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乃是企图把它作为一个目前计算历史年代的尺度，借以探索这一带自然环境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

现在“城川古城”屹立在一块东西狭长的草滩地的中心。这块草滩地南北之间宽不过 3~5 公里。在这一距离之外，南北两面都是一望无际的流沙，形成了大小不等的新月形沙丘和沙丘链。沙丘一般高 3~5 米，最高的可达 20 米左右。草滩上地势平坦，土质主要是冲积、湖积形成的砂及粘土，地下水位很高，一般在距地表 0.5~2 米之间。这一狭长滩地，向东一直延伸到红柳河西岸。在去河岸不远的地方就是大沟湾。

值得注意的是沿着这一狭长的草滩地，有十多个大小不等的湖泊，主要分布在东西一线上，有的还有小河互相沟通，形如联珠(图 70)。其中最大的一个叫做沙那淖尔，东西长约 3 公里，南北减半，平水时期的最深

水位达 2.4 米。^①

就在沙那淖尔南北两面的滩地前缘，发现有长达 6~7 公里的東西方向延伸的砂堤各一道，高 2~3 米，宽 3~5 米。北缘的砂堤与沙丘地带的距离大约 500 米，而南缘的砂堤距离则将近两公里。这南北两道砂堤显然是古代某一时期湖滨砂堤的残存部分。其次，在城川古城与大沟湾之间的草滩上，还有十分触目的基岩残丘一处，孤立地表，高约 20 米，东西 550 米，南北 600 米。四周坡度都很平缓，上面散布着一些砂岩砾石和古代的陶器、砖、瓦碎片，附近居民称它作黑疙瘩。残丘东南方的背风坡一面，在距离地表 5~6 米处的两个土壤剖面上，可以看到在 3 厘米淡黄色现代风成砂的表层之下，都有一层 20~30 厘米厚的黑褐色砂质粘土和同样深度的黄褐色砂质粘土，这又很象是湖相沉积物，可以说明这个残丘曾是矗立于湖泊中的一个岛屿。把这个残丘和上述残存的南北两道砂堤联系起来，就足以说明现在“城川古城”所在的这一片草滩，曾经是一个面积至少在 1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如果“城川古城”果然就是唐代的长泽县城或公元 820 年移治后的宥州城，那么这个古代的湖泊，在 1150 年前就已经明显地缩小了，至少它的南半部——也就是现在“城川古城”所在的地方，业已成陆。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在人类历史时期以来，这个古代的湖泊正在日益缩小，而现在点缀在这一带滩地上的沙那淖尔等十几个小湖，只不过是它最后的残迹而已。

这个古代湖泊的逐渐消失，只是一个地方单独发生的现象呢，还是自全新世以来在西北干旱地区普遍存在的事实？是完全出于自然的因素呢，还是包含着人为的原因？这一现象和当地近代流沙的形成又有什么关系？自然环境上的这种变化，给古地理学和第四纪地质以及地貌学的研究带来了饶有兴趣的问题，同时也为追踪历史时期这一带流沙的来源和移动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应该继续探索，弄清真相，这就是历史地理学所必须承担的任务。为了更好地进行这项工作，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十分重要。如利用孢粉分析来研究这个逐渐缩小的古代湖泊的沉积地层，可以有助于了解过去这一带植被的分布和它所反映的气候变化的情况；而¹⁴C 的应用，在必要的时候，又可以得到更为精确的绝对年龄的测定。

① 《唐书》，卷三八，“地理志”。

② 《元和郡县志》，卷四，页九上。

① 鄂托克旗水利队与城川公社农技站 1965 年测。朱士光引。

但是在目前来说,还必须借助于实地考察才能推动工作前进。例如《水经注》讲到奢延水时,除去上面已经引用过的那段文字外,还有讲到“奢延泽”的一句话,现在一并抄录如下:

(奢延)水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东北流,汉破羌将军段颖破羌于奢延泽。^①

这里所说的汉代奢延泽,和上面所讲的城川古湖有何关系?奢延水发源的“赤沙阜”又是现在什么地方?这个名称有无写实的含义?因此又联想到上文所讲的长泽县,其命名是否也和其附近正在消失中的那个古湖泊有关?关于长泽县的建置沿革,《元和郡县志》也有记载说:

后魏于此置长泽县,属阌熙郡。隋罢郡,以县属夏州。皇朝(即唐朝)因之。阌熙故城在今县西南二十里。^②

如果“城川古城”确是长泽县治,那么现在它西南 20 里的范围,已经都是连绵不断的沙丘。阌熙故城是否已为流沙所湮?或者还有遗迹可见?这些问题单从古代文献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只有进行现场考古调查,才有希望得到解决。把这些问题一一孤立起来看,似乎并没有什么考古学上的价值,但是如果把它和周围自然环境的今昔变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么弄清楚一些历史地理上的问题,增加一点知识,还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一研究对于全面了解毛乌素沙漠的变化,从而为利用和改造沙漠的伟大事业作出贡献,乃是十分必要的。

(原载《文物》1973 年第 11 期)

① 《水经注》,卷三,页一七下。

② 《元和郡县志》,卷四,页九上。按原书在这段引文的前面,还有一段,说:“长泽县本汉三封县地,属朔方郡,即今县北二十里三封故城是也。”李吉甫的这一考证,是完全错误的。汉朔方郡三封县不在黄河河套以内的鄂尔多斯高原,而在河套以西现在的乌兰布和沙漠之内。1963 年夏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乌兰布和沙漠综合考察队历史地理及考古专业组,曾考定了汉朔方郡三封城以及临戎城和麻浑城的废墟。详见本书《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

从考古发现论证陕北榆林城的起源和地区开发^①

陕北榆林地区,正当毛乌素沙漠的南沿,经常受到风沙的危害。过去有所谓“榆林三迁”的说法,意即榆林自建城以来,为了逃避风沙的威胁,已经三次向南迁移城址。过去这一说法传播很广,并为一些中外地理学家所引用,作为我国西北部沙漠南移的证据。就是到了现在,也还有人未能分辨这一传说的真伪,客观上起了继续传播的作用。难道榆林城真的曾经向南不断迁移么?来自西北的风沙果真是不抗拒的么?中国西北部沙漠不断向南侵袭的说法究竟有多少根据呢?面对这些问题,应该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弄清事实,揭示真相,以便更好地认识和改造自然。

一、关于榆林城的起源和“榆林三迁”的旧说都是错误的

为了辨明“榆林三迁”的问题,首先应该查明榆林城的起源。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旧日被认为是权威性的“定论”,实际上也是不足凭信的。例如清雍正《陕西通志》曾经这样写道:“榆林府因明榆林卫旧名也,本汉榆溪塞……明因塞置卫,遂取名焉。”^②这就是说现在的榆林城,在明为榆林卫,在清为榆林府,乃是起源于汉朝的“榆溪塞”。因此,现在穿过榆林城北红石峡、紧傍城西侧南流的清水河,也就获得了“榆溪河”的名称,而且还被广泛引用在地理文献中。从此榆林城、榆溪塞和榆溪河三者的命名,遂被认为是同一起源,似乎很少有人怀疑了(图 71)。

① 本文系与袁懿方同志合作,作者执笔。原题为《风沙威胁不可怕,“榆林三迁”是讹传》。

② 卷三,建置一,页六上。

